

锐视点

探研本质,开启新知

作为一部小成本、小制作的抗战题材电影,《我的上高》在电视频道播出后,在业内赢得广泛赞誉。这部被誉为“现象级”的口碑之作,对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亦有诸多启示。

《我的上高》以中共地下党员、上高县长黄清谷为主角。影片没有战争场景的恢宏壮烈,以弱抵强的慷慨豪迈,甚至从始至终未曾出现一个敌人形象,但却彰显了民族大义、文人风骨,释放出中华文化的撼人力量。

即使在生死关头,黄清谷始终坚守“职守”与“操守”,这是贯穿影片的靈魂主线。他最先关注的是学堂,“为国读书,抗战到底”的学训令人动容。处理驻军和百姓的矛盾与冲突,黄清谷据理力争,誓死捍卫上高百姓的礼义之大。几来几往中,守城官兵与上高百姓心服口服,从而心无芥蒂,万众一心。

影片中许多细节耐人寻味。身为文人的黄清谷虽手无缚鸡之力,却始终恪守职责,奋战在一线,同时不忘叮嘱妻子:“你是读书人的家眷,遇到事情不要慌张,不要失态,要与民争利。”文化风骨可见一斑。置身“国破山河在”的境遇中,文人的形象始终含蓄内敛、沉着冷静、意志坚定,反衬出一种看似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精神。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实际上承载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士人伦理,在黄清谷身上集中体现为坚守礼义信仰、九死无悔的献身精神。在《我的上高》中,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文化力量并未在战火硝烟中湮灭,即便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文化依然有“根”,读书人依然有“用”。

从影片中的诸多细节,观众都可以感受到,战斗的胜利既有符合人物性格逻辑的中国传统士人精神作先导,又有民间深厚的文化氛围作支撑,艺术再现了这场胜仗的“骨格”和“血肉”。

影片《我的上高》的成功,也引发了笔者对于当下亟待突破瓶颈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一些思考。

一是重建评判历史题材影视剧成功与否的美学尺度。当下的影视剧创作,成功与否的最大标准无疑是票房的多寡和收视率的高低。资本运作的逐利逻辑,取代了作品的美学标准。如果不能以票房论英雄,而以观众口碑、价值输出、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等为尺度综合评判,影片《我的上高》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抗战题材影片。在既往的经验中,我们看到了太多资本运作、制作恢弘、形式花哨、明星云集的抗战题材影视剧。然而,讲好抗战故事,不光取决于制作的精美和场面的宏大,更有赖于健全完整、深刻省察的价值观建构。《我的上高》的成功,正在于以小成本制作,建构起深远的价值,传达出宏阔的情怀。

二是反思类型英雄的模式化塑造。在近年来的历史题材影视剧剧中,“草莽英雄”“传奇英雄”“偶像英雄”等类型化英雄塑造,几成模式,大量的跟风复制消弭了英雄形象的审美价值。影片《我的上高》在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独出机杼,创造了黄清谷这样一个“文化英雄”的崭新形象。其独特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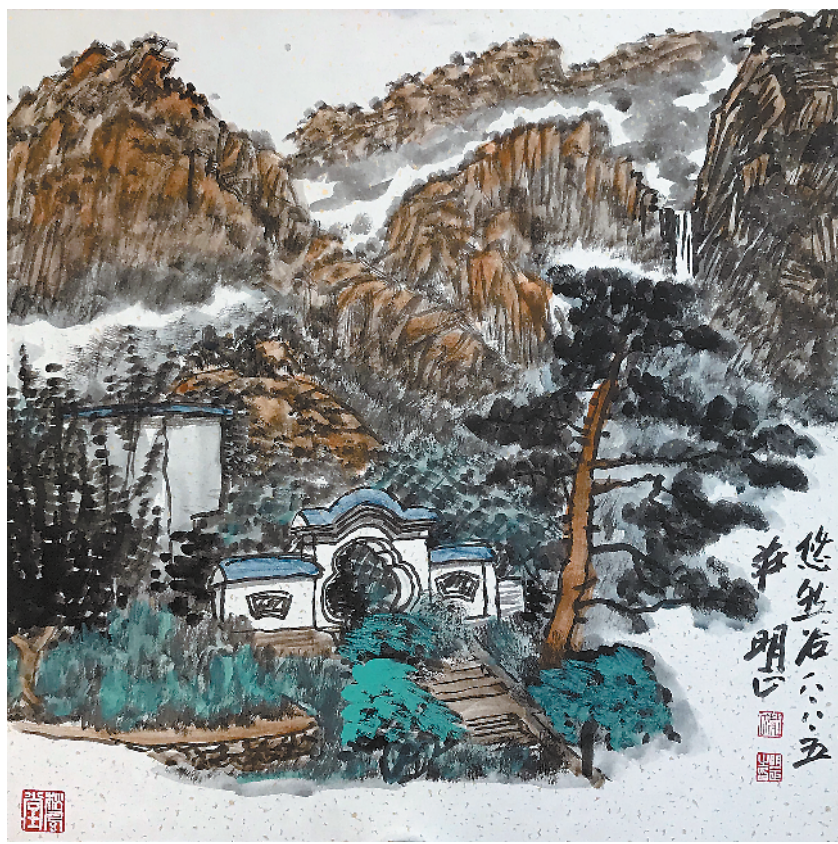
开掘历史深处的文化意蕴

张倩

在于,战争场面虽然缺席,但是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却得以傲然挺立。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其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展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三是摒弃狭隘肤浅的“伪爱国主义”叙事。近年来,抗战雷剧一度甚嚣尘上,有的作品叙事逻辑混乱,故事情节“脑残”,抗战历史沦为武侠、言情、甚至戏仿、穿越的背景。这背后的问题在于创作者的历史观念落后、审美趣味低级、原创能力低下。抗战历史承载的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牺牲和深沉的情感,那些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实则极尽调侃戏谑为能事的娱乐化叙事,应当休矣。不能再让那些价值观念错乱、狭隘肤浅的“伪爱国主义”叙事侮辱当下观众的智商、诋毁抗战英雄的形象、混淆年轻受众应有的历史观念。

电影《我的上高》作品本身并不完美,剪辑和制作上的粗糙简陋客观存在,却依然不失为“小成本、大情怀、深意蕴”的启示之作。讲好战争历史故事,不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命题,更关乎今人如何审视继承那份悲愤壮烈的历史遗产,以何种精神面貌走向未来。



松壑悠然(中国画)

庄明正作

长征

第4400期



主旋律叙事的美学升级

傅逸尘 成孝湜

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傅逸尘:黄大年的报国情怀和科学贡献确实令人感动,但是他的经历尤其是从事的专业对于电影表达来说其实是很有难度的。毕竟,大量的戏剧化冲突是构成剧作的关键。你是如何化解这其中的矛盾的?

成孝湜:这的确是《黄大年》这部戏的难点,但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电影是要讲故事的,要讲有意思的故事。观众最想看的还是黄大年这个人。我更看重的是人物情感、人物关系、人物命运。我写的是家国情,是人性的闪光点,我要通过有趣味的故事,来塑造一个有性格、有思想、有情怀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的故事表达我对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的思考。

傅逸尘:在《黄大年》中,我感到你在日常经验中强化了英雄性的建构;在基本人性的基础上,强化了崇高、阳刚、壮美的审美表达。在你眼中,新时代的英雄叙事应该具有怎样的面相?

成孝湜:英雄性和英雄叙事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毋庸讳言,当下有很多影视作品迷失了英雄的气质。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影视剧里,为了迎合或套用“小鲜肉”的概念,原本具有阳刚之气和崇高感的英雄形象被相貌精致、气质孱弱的中性化人物所替换,这也间接导致了青少年中流行的审美倒置。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塑造黄大年这个人物形象时,在保证真实性的

前提下,我有意识地强化了他雄健的身姿、自信的话语。从内心到体魄,这都是一个典型的符合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男子汉形象。在此基础上,表现他的担当、睿智、健康、爱国家、重情义等精神品质。换句话说,在形象上,我追求的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位才是英雄。影视作品塑造英雄形象,底线在于人格的独立和健康。

傅逸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域,重新审视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就会发现,我们虽然一直在强调中国电影要与国际接轨,要走出去,但在思想理念上却多是跟随、学习和模仿的状态。因此,想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主旋律电影,就具有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意义。这个命题的核心是人类的视角,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关切,是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以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情感和思想。

成孝湜:这个问题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我在《黄大年》中着重表达的恰恰是具有恒常光彩的人性亮点,是追寻理想、守护真爱等人类共有的优秀精神品质。当下的中国电影,首要的是重拾文化自信。要敢于和强者对话,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建构自己的审美、传达自己的思想,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因此,在创作上我们应该深入思考,无论是主旋律影片还是商业影片,怎样有效地对外传播我们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可

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圆桌上占有重要一席,并且持续、有力地发声。

傅逸尘: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走过了四十年风雨历程,黄大年这个人物形象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恰逢其时了。黄大年说话、做事的那种“范儿”,其实也表征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强。作为一名青年剧作家,你或许更能够理解年轻一代受众的审美方式和情感结构。在你看来,主旋律电影怎样才能赢得更多年轻受众的青睐?

成孝湜:一直以来我们有种思维惯性,似乎只要一谈到主旋律,基本上就是远离娱乐性和受众。然而,电影毕竟要在影院播放,接受观众的评价。我的努力方向就是尽量保持作品的趣味性和故事性。当然,有时娱乐性和趣味性和主旋律的主题有所矛盾,但这不正是电影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应该回到一个基础概念,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这个命题,本身就具有风格化的标签,因为它带有中国气派。所以说我们首先在电影的类型化和故事编织上下功夫,绞尽脑汁。讲故事的能力是重中之重,这个能力足够强,就能克服上述困难,也能避免出现所谓的“雷剧”,同时避免堕入虚无空洞和不知所云。剧作者在一部电影的创作中,要加入自己对时代、对现实的整体性的思考和判断,这种思辨的过程恰恰就是寻求突破、赢得受众的必由之路。

路瞬间展开,语言自然流淌。

卫平——“我”高考落榜之后,没有自暴自弃,没有被苦难击垮,没有投入金钱欲望圈,而是从内心升起另一种不服输的强力,彰显出挑战命运的执着韧性。高考落榜之后的“我”回乡务农并不满足现状,在“偷读”阅读文学经典(路遥的《人生》《唐诗三百首》等,尤其是镇文化馆郑馆长推荐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夜晚的写作磨练中寄托情思。他虽遭父亲百般“阻挠”,但坚持自己的选择。在郑馆长的支持下,“我”在写作中不断进取,提升自我,先是应考初中语文老师,最后应征入伍,完成生命的精神故乡。“我”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的现实生活,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是“我”一辈子的理想追求,是任何人不能以任何方式入侵、干扰或破坏的。

韩光的中篇小说《白雪歌》(《海燕》2018年第二期)书写了一个农村高考生第二次落榜后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小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围绕父子与子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展开叙事。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父与子的矛盾冲突、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差异,还有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小说的故事从作者的故乡——辽西边地的泥土中自然生长,带着大地的气息,以高密度的细节和超鲜活的语言复现自在可视的生活。

“白雪歌”,是文学里的阳光,也是作者生命里的阳光。它预示着“我”的成长,也是自由可感的精神生活。由此,文学里的阳光哺育而生的成长故事——《白雪歌》自身也散发着阳光,充盈着正能量,昂扬着积极向上的审美质感。这是一篇耐读的小说,以传统叙事方式讲故事,七个部分环环相扣、彼此依存。但它不是靠华丽的语言和跌宕的情节吸引读者,而是以土里土气的泥土味儿召唤读者。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带着作者对于农村的最原初的记忆,也饱含对逝去青春的追忆。无论写什么,作者都离不开他作为战士的生存经历与生命体验。确实如此,一写到和部队、军人相关的内容,他的思

想力,而动词的妙用更加突出文本的鲜活与动感。“扑”“拱”“刨”“射”“拽”等动词,源于作者的乡村经验,更得益于作者的文学性表达。与这些动词相连的乡村土语、俗语、日常用语被文学化、审美化,让读者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这些动词犹如一个个闪光点在本文中跃动,连缀成一幅幅动感画面,增强了作品的审美质感。

《白雪歌》负载了作者太多的情感与思考,诸如乡土记忆与军旅生涯的对接、创作转型的“灵魂冒险”等,但文本的核心在于文学里的阳光与成长,让我们触摸到原生状态的审美质感,见证高扬的生命理想。

价实,缘于镜头低下傲慢的长距,去凝视那些抉择时刻。故事在拥有体温的时候,自然地生发意义。就像李娃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当真是视死如归。

意义不仅不苍白,而且就这么手起刀落,沾着泪滴血水惊心动魄地到来。全书有姓名的人物达几十人之多,李亚不厌其烦地遇见他们,触碰他们,点亮他们。夜空被繁星托出光迹,他们一起晶莹洁白地对抗寒冷黑暗的雪夜。

于是爱情降临,信仰降临,友谊降临,生死降临,勇气降临,智慧降临……

李娃死里逃生,载誉而归,又一次回到上海滩。方公馆门前的“任意门”瞬间关闭。最后一章,故事全部反转。你像看侦探小说般竖起汗毛,却不是发现了惊天的阴谋。你像看言情剧般痛彻心扉,却并没有生离死别。你只能是一边惊惶一边落泪。

作家李亚下定决心给读者致命一击。就像作为习武之人的李亚,怀着制胜法宝,却不动声色地与你过招了三十八个回合。他与你不露声色地缠斗,并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那更像是一道无法说破也绝无捷径的禅机。他陪着你这个选定的对手,一起精疲力竭。他必须毫无保留。这种与读者陪伴般的厮杀,不是那种灵巧的暗藏杀机,不是狡诈的阴谋,不是欺骗和诡计。因为他也不能爬起,起初跳进的这个深潭,他并不能爬上岸。他无法照看页码,也不能另辟蹊径。他只能全力以赴,他几乎忘掉自己。他或许真的无法确认在专注与无意之间,那制胜之招能否既轻又重地跃过窄门。然而,一切结束之时,最后一章终于到来。文学像一个新生儿,就这么毫无防备地光溜溜地来到面前。

一切戛然而止,你只想哭,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前一秒还是紧张拥挤的人间万象,此刻你却置身于空旷静谧的图书仓库,任你舒展,任你驰骋。然而你只想哭。落泪也许只是一种我们遭遇到文学时的本能反应。但李亚真正祈求降临的,不是琳琅满目的意义,不是光洁锃亮的意义,而是文学本身。

长篇小说像是去寻觅时间密码。手作的人生如何能到达真切,有限的书页妄图活刻出永恒,这不是小伎俩可以实现,也不是重锤可以夯成的,它必须既轻又重,悠然而至,就像我们从来都是和命运不期而遇。

从远方的战争史,到近前的图书馆。书页早已呈现了历史,呈现了世界。下雪的夜晚能看到星星吗?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看。

阳光与成长

吴玉杰

雪夜见繁星

萧萧

正像评论家李云雷所概括的那样,李亚的长篇小说《花好月圆》(湖南文艺出版社)“是一部厚重的民间之书,也是一部小人物的生活史。小说以口述史的形式讲述了一个百岁老人前半生的经历,也勾勒出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面影,呈现出了一个小小人物眼中鲜活生动的历史。”

小说的故事显得扑朔迷离,闪耀着诡谲而神秘的光泽。李娃离开李庄,离开亳州,误打误撞来到上海滩。方公馆的大门,隐藏着时间的“任意门”。转眼间,他早被命运穿上了一套并不合体的制服,去伺候席间那些大人物。抖一抖兰台典籍,李亚竟毫不客气地恭请那些叮当作响的大人物站成背景。李娃变成下凡的顽石,将以他的经历去绘制一幅历史夜空的星盘。

“李娃,你不许死。”大小姐的命令像一封谏言,挂在了平凡的李娃身上。而那段民族受难的滚烫时光,让他的“活”既是祝福,又是诅咒。他死不了,他一直活。他要活过长夜,看到暴风雪,看到满天星,看到旭日升。

看到方公馆中的十分繁华,百般精致、万种风情,他踉跄推搡,随高就低,马不停蹄。他亡命天涯,足迹注定踏过整条战线,头顶的夜空将布满繁星。难忘的绝不仅仅是大表嫂、柳雪琳、蔡琅环,还有那一个个战士,悄无声息的牺牲,稍纵即逝的光彩。他不忍将他们扔进虚无的时空,他要端端正正地为他们取名,为他们立传,为他们冠以价值。这价值真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